

魯迅研究

806
7233

魯 迅 研 究

刘泮溪 孙昌熙 韓長經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5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656 字数 198,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frac{1}{4}$ 插页 1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 1.00 元

統一書号: 10020·656

定 价: 1.00 元

目 次

魯迅的生平和事業·····	1
魯迅的科学思想·····	50
魯迅怎样發展了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	78
魯迅所开辟的中国文化的大众方向·····	102
魯迅的現實主义的發展道路·····	128
魯迅小說的特色·····	164
魯迅杂文的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	195
魯迅的詩歌和書信·····	227
魯迅与文艺統一战綫及文艺批評·····	251
魯迅整理中国文学遗产的成績·····	287
魯迅介紹世界文艺的成績·····	318
后記·····	357

6.11/10/53

魯迅的生平和事業

一 魯迅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發生以后，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中国，破坏了中国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础，促使中国的封建社会解体。按照社会發展的一般規律，代替封建社会的應該是資本主义，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資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国变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它們就要勾結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資本主义的發展，并采用“一切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得中国人民大众日益貧困以至大批破产，穷困到世界罕見的程度。因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

的矛盾，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尤以前者为最主要。这种矛盾发展到清朝末年，就更加尖锐化了。帝国主义通过几次血腥的侵略战争和一連串的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政治命脉、文化命脉。清廷也越来越显得腐败卑劣，为了延续它自己反动统治的寿命，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给帝国主义；对于人民的剥削、压迫，也更变本加厉。这时摆在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为国家民族求独立，为人民大众求解放。历史已把这种伟大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要我国的劳苦大众首先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同时不论在军事、政治方面，还是思想、文化方面，也都是迫切需要巨人的出现。而在这样一种伟大的历史转变的时代，卓越的历史人物和先进的思想艺术的产生是有着一定的必然性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既提出了新的任务，社会就需要能够解决这种任务的人才，人民和历史条件也迟早要创造出这种英雄人物来推动历史前进。鲁迅正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担负这种伟大历史任务的英雄人物。

鲁迅的家世

鲁迅原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陰历八月初三），出生于绍兴城内东昌坊口一个姓周的家庭里。绍兴周家原是一个大家族，鲁迅一家是住在新台門的一

支，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新台門有副对联是：“品节詳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鲁迅故家的正屋中央供着一塊牌位，上写：“天地君亲师”。鲁迅出生时，家境虽由富而貧，但尚有四五十亩水田，生活不成問題。祖父周福清（介孚公）是翰林，由翰林院授編修，后改放外官。他的性情非常耿直，不論在什么場合，就毫不容情地指責或批評別人的是非曲直，这自然容易遭受別人的猜忌。他在江西金谿做知县时，并不計較职位大小，只求做个清官。因此自理訟詞，并叫年幼的外甥偷偷走进監獄去查看，假如知道管牢的有拷打虐待犯人的情事，他就連夜坐堂，亲自用火光照看伤痕，严办獄卒。祖母性和善，非常喜愛鲁迅，常給他講故事，教他猜謎語。父亲周伯宜，是讀書人，平素寡言笑，看去似乎是很严正，实际并不厉害。他沒有做过官，也不善營生，用旧式方法管教孩子，要把兒子訓練成剛强、正直、坚定有骨气的人。他認為人如受欺，應該强硬对付，但若無端去欺侮別人，也是不應該的。母亲姓魯，名瑞，乡下人，为人能干、善良、寬厚、坚持，由于自修得到能够看書的能力。

鲁迅从他的家族中承襲了些什么呢？祖父那种严正、耿直、批評別人是非曲直的精神，母亲那种寬厚、坚持的精神，以及父亲教給他的那种正直剛强的精神，都給鲁迅儿时性格一种强有力的影响。

童年生活

魯迅幼時聰慧異常，記憶力強，過目不忘。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是私塾教育。塾師叫學生整天呆坐在那里，教材的內容不管你懂不懂，是先叫你吞進去，記住，等到了再給你開講，叫你“反芻”。像這樣的教教育方法，當然不能滿足兒童智慧正常發展的要求，因而除了大人認為“正規”教育以外，有一些事物倒是魯迅最喜愛的。這些新鮮事物擴大了魯迅的視野，加深了他的生活趣味，日後對他發生過極大影響，而且回憶起來也是非常甜美的。

由於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又因他外祖母家住在農村，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群，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氣。魯迅對野孩子的生活極為羨慕，他和一個短工的兒子做了朋友，這孩子便是運水。他們真是一見如故，這孩子教給魯迅怎樣在大雪之後捕鳥雀，怎樣在夏天夜晚的金黃色的圓月下，手握鋼叉向啦啦响着的吃瓜的獐刺去，以及許多海邊鄉村的新鮮稀奇事。另外，魯迅還常隨母親往臨河的小村莊安橋頭外婆家去，他在这里和一群“野孩子”也建立了友誼，一同釣蝦，放牛，看社戲。這使魯迅開擴了眼界，和鄉村大自然有了接觸，和勞動人民有了精神上的聯系。

由於家庭出身不同，魯迅和這些“野孩子”中間畢竟有一些距離。在“野孩子”眼里，魯迅雖會念“秩秩斯干，

悠悠南山”，可是在放牛时，黄牛水牛都欺生，敢于欺侮他，这就使这些“野孩子”不再原谅他会讀“秩秩斯干”，却对他嘲笑起来。这种距离在客观上日漸加大，用傳統的眼光看来，这两种人走的是相反的路。难怪到后来魯迅長期离开了家乡，他們中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二十年后的运水也称魯迅为“老爷”，甚至叫自己的兒子給“老爷”磕头。进步的知識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間的这种壁壘，是被反动統治者造成的，日后的魯迅就是为了摧毀这种壁壘而斗争。

除去混进“野孩子”的群里，給魯迅的童年生活增加了不少生趣外，他还对于民間文艺及美术、綉像非常喜爱。他从祖母和長媽媽那里，听到了一些謎語、傳說、故事（例如水漫金山的故事、長毛的故事、美女蛇的故事等），又看过迎神賽会，看过社戏，并且在演目連戏时，曾充当过义勇鬼，这使他和民間文艺有了接触。民間文艺啓發了他爱美的观念，更使他和劳动人民的願望以及訴苦、反抗的精神相通。当他听了祖母給他講的“水漫金山”的故事后，心中很不舒服，怪法海和尚多事，替白蛇娘娘抱不平。他唯一的希望便是这鎮压着一个美丽灵魂的雷峰塔赶快倒掉。而对于螃蟹里的“蟹和尚”永無出头之日这一傳說，認為非常滿意。

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时，常背着先生偷描小說上的綉像，放学回来，常到書坊去买画譜。关于講草木虫魚的

書，他也喜愛。有一次听到一位远房叔祖講繪圖的“山海經”，使魯迅非常渴慕，念念不忘。后来長媽媽給他买了一部，魯迅立刻对她發生了新的敬意，認為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都做得成功，她确有偉大的神力。

又有一位長輩，贈給他一本“二十四孝圖”，他开始非常高兴，等到听人講解了全部故事之后，就有反感了，特別对“老萊娛亲”“郭巨埋兒”兩圖，感到不快。如对“老萊娛亲”一事，厭其伪詐，以为“搖咕咚”是不該拿在七十岁的老萊子手里的，他應該扶一枝拐杖。可見魯迅当时对圖画已有初步的鑒別能力和批評眼光，而且重真实性了。

乡村大自然的景色、“野孩子”的生活，以及民間文艺和繪圖的書，引起了魯迅極大的兴趣与爱好，这些兴趣与爱好，看似平行，实则互相联系，都影响着他的生活与性格，以后日漸發展，都服务于他那偉大的理想。日后从事文学，表現农村的貧困，深刻揭發社会的矛盾，以及研究汉画、造像，提倡木刻，都与此相关。至于批評的眼力，也在童年开始萌芽。而从家族得来的那种公正、剛强、坚持的精神，在他后来与逆境战斗时，又得到了發展。

以上所叙述的魯迅童年生活这一段，在魯迅的一生中，也可以說是較為幸福的吧。这使他日后回忆起来，往往起一种美的感觉、一种向往的心情，并常从此获得創作的灵感。从十三岁起，魯迅便开始和社会有了接触，要亲自尝受人世的酸辛了。

擺脫封建家庭，探求生路

魯迅十三歲時，祖父因科場案下獄，這使他的家庭發生兩種變化：第一，經濟來源斷絕，僅靠四五十畝水田，大家坐吃山空，生活日益窘迫；又加獄吏役卒苛求勒索，以致家庭支持不住。第二，周家望族，一向受人恭維，現在祖父下獄，官沒有了，遠親近戚不免有些勢利眼，有的就投井下石，加以欺慢。因此魯迅的家庭，在經濟方面，在威望方面，完全破產（這種家庭的破產，自然也反映着官僚地主階級必然沒落的命運）。魯迅和他的弟弟，因為怕受祖父下獄一事的連累，曾有一個時期被寄養在城外大舅父家裏，受盡奚落，被稱為“乞食者”。這使他開始体味到旧社會人世的真面目，是何等冷酷無情。

魯迅家中自從遭受這次事變，使他父親的性情也起了劇烈的變化，時常喝酒，發脾氣，不久就患了水腫病。所請的當地的“名醫”，不但診費貴，用藥稀奇古怪，藥引也很難找。有三年多的工夫，魯迅幾乎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從比他高一倍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和他一般高的櫃台上去買藥。結果是耗盡了家財，受盡了侮蔑，得到的是“醫能醫病，不能醫命”，魯迅的父親就這樣死去了。

祖父下獄和父親生病這兩種變故，使魯迅親嘗到世態的炎涼，他後來在“吶喊”自序裏用兩句話加以總結：

“有誰从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为在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家庭的衰落，人世的冷酷，使他对于周圍人的臉早經看熟，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于是惹起了他对旧社会的反感，剛强正直的性格支持着他必須另找出路。这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作幕友或商人，这是紹兴衰落了の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条路，要不然就是上洋学堂，学洋务。当时社会上以为第三条路是走头無路的人走的，是將灵魂卖给鬼子，要受奚落。魯迅既憎惡世人的嘴臉与心肝，便决定了走这第三条路。于是在一八九八年（是年“戊戌政变”發生），他十八岁的时候，毅然跨出了封建家庭的門檻，到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因对学校不滿，次年又改入矿路学堂。

在魯迅的身心日趋成長的这些年代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厉害，清政府也越来越腐敗無能，丧权辱国的事件，層出不穷。一八九四年被日本打败，次年訂立“馬关条約”：中国割地賠款，日本在中国取得了領事裁判权；一八九八年帝俄又进兵旅順，强迫租借旅順、大連；德国也借口曹州教案，进占膠州灣；法国也租借广州灣。这时虽有李鴻章張之洞的洋务运动，以及康有为梁啓超的变法維新，但在实际上并不能挽救民族危亡。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給魯迅以强烈的刺激，使他的心思不能不从个人、家庭扩大到社会、民族和国家。而魯迅所奔赴

的前程，與其說是給他個人找生路，不如說是給中華民族找生路。他極力想使個人出路與中華民族的出路在生活實踐中取得統一，由於二者之間尚有矛盾，使他不斷地在探索的過程中前進。

魯迅入礦路學堂的第二年，學校總辦換了一個“新黨”（維新派），因此校中看新書的風氣流行起來。在這一時期，魯迅讀了“天演論”（赫胥黎著，嚴復譯）及其他新書譯本，從此接觸了進化論，以至成為他前期的主導思想，而且因此把從事於科學研究與提倡工作（自然尚有其他原因），作為民族解放的途徑。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從學習和實踐中，証明了洋務主義、改良主義的路走不通。就是社會制度若不改變，要在清朝統治的腐朽基礎上，來提倡自然科學，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自上而下地來改造中國，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完全是一種幻想。魯迅這種思想到一九〇七年寫“文化偏至論”時才告成熟，這時的具體感受是：“爬了几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听了几年講，下了几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么？……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餘的只還有一條路：到外國去。”（“朝花夕拾”：“瑣記”）

在日本的生活

魯迅二十二岁时（一九〇二），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学。时当辛亥革命前夕，东京留学界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原来自一八九七年，孙中山先生为扩大兴中会組織，由欧洲赴日本，便在居留日本的中国人心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同时其他反清政团的首領，如华兴会領袖黃兴，光复会領袖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等，都在日本，进行反清活动，或从事講学以聯絡革命志士。而当时不少的留日学生，由于接受了一些民主与科学的新知識，又亲身感受到中国国际地位低落加于自身的刺激，在这种革命浪潮的推动之下，便很快地成为革命思想的傳播者和革命行动的組織者。他們在政治上，不断發起抗清的爱国活动，在文化方面，又倡办革命書报。魯迅撰稿的“浙江潮”，即是其中之一。魯迅这时的思想趋向，显然是站在革命反清一方面。他大約就在这时候讀了“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作的“革命軍”，他認為别的千言万語，抵不过他这淺近直接。别的留学生的活动大都是偏重在政治方面，魯迅却重在介紹自然科学，注意中国文化、思想、国民性等問題。他在文化方面的啓蒙工作，这时已奠定了初基。而从一九〇三年他所写的“自題小像”一詩中，更充分表現出他那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并誓以复兴祖国为其終生志願。

魯迅在弘文學院補習日文期間，課餘喜欢看哲學、文學一類的書，並常與他的至友許壽裳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後來，他又談到志願學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並為“浙江潮”撰稿，寫“斯巴達之魂”，鼓吹英勇犧牲精神，又介紹居里夫人所發現的鐳錠。一九〇四年，即日俄戰爭爆發的一年，魯迅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的目的是：救治像他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還可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由於藤野先生“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又加上自己的努力，成績還不算壞。不過在日本學生看來，“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他們疑惑藤野先生在給魯迅改筆記時，做了暗號，魯迅才能有這樣的成績。於是流言襲來，接着學生會干事也到他寓所里來檢查講義，並寫信叫魯迅改悔。魯迅留學外邦，早已深受刺激，這次流言的襲擊，更使他親身體驗到中華民族國際地位的低落，也更激發了他熱愛祖國的感情。

究竟用什麼復興民族、國家，這是魯迅經常考慮的問題。接着魯迅又從時事影片上看到了一個中國人給俄國做偵探，被日軍捕獲槍斃，一群中國人圍着看熱鬧的情形，而他們的體魄都是非常強壯的，這使魯迅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遂於一九

○六年停止学医，想提倡文艺运动，以批判鴉片战争以来反动统治者在群众中造成的民族失败主义的心理，以改变愚弱的国民精神。他之所以能做出这种决定，主要基于革命爱国主义的热誠，基于国家民族的需要，同时也受到了“摩罗詩人”言行的鼓舞。因此他一見了摯友許寿裳，便極為沉痛地說：“我決計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豈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魯迅这种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喚起民众的思想，解放他們的个性，擲起反抗的精神的主張，是远远超出于当时中国思想界之上的。

从事文艺运动的实践工作，便是着手办“新生”杂志。这“新生”在娘胎里就遭到冷嘲热諷，待到快要出生时，資本和稿件又發生了問題。当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輕視……”因此很难得到他們的支援，結果“新生”乃告流产。

文艺杂志沒有办成，但魯迅仍努力不懈，一九〇七年为“河南”杂志写“文化偏至論”及“摩罗詩力說”等文，徹底批判了洋务主义与改良主义，并提出了对国体的主張及对文学的主張，同时介紹了被压迫民族文学，以鼓吹反清情緒。

一九〇八年到小石川民报社，从章太炎学“說文解字”，这是因为魯迅向往他那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問的革命家”。魯迅于此实际参加政治組織，为光复会之一員。因出入民报社